

政
治
学
论
丛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 比较研究 (第二版)

关海庭／著

苏联的解体让我再一次领悟和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原因把俄罗斯推向这种境况呢？由此，我想到了国家控制能力问题。大国，特别是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原来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和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法治化能力、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应当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 比较研究

(第二版)

关海庭／著

政

治

学

论

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关海庭著.—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1

(政治学论丛)

ISBN 978-7-301-26427-0

I. ①中… II. ①关… III. ①体制改革—对比研究—中国、俄罗斯 IV. ①D61
②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020 号

- 书 名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第二版)
Zhong-E Tizhi Zhuanxing Moshi de Bijiao Yanjiu
- 著作责任者 关海庭 著
- 责任编辑 倪宇洁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27-0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 印 刷 者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9 印张 528 千字
-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 2015 年 11 月第 2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7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是我从事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的价值,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评判。值得欣慰的是,二十余年的研究,虽然“筚路蓝缕”,但为了开启中俄体制转型比较研究这片“山林”,我曾付出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我曾于1994年、1998年和2005年三次赴莫斯科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当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并实地考察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的各大城市之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些良好的基础设施:莫斯科地铁、莫斯科运河、造型迥异且宏伟的俄式建筑、每座城市周围呈蛛网状密布的电气火车、伏尔加河沿岸的水利枢纽,这一切有力地彰显着俄罗斯的大国风采。透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塑在上面的浮雕,我仿佛感受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冲天的劳动干劲和凯歌行进的时代气息。但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基础设施的状况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陈旧。比如以罗蒙诺索夫的名字命名而雄居世界一流的莫斯科大学,其宏伟(据说有一万多个房间)的主楼,现在映现出一幅破败的景象:门窗缺损、水管漏水、墙皮脱落、地板斑驳陆离。其实这类建筑的维护,并不需要很多的经费,稍加翻修,就能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俄罗斯需要维修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国家拿不出钱。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纷争和价值观的冲突已经严重阻碍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很少能看到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豪迈与奔放,呈献给外人的只是沉重与迷惘。苏联的解体让我再一次领悟和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原因把俄罗斯推向这种境况呢?由此,我想到了国家控制能力问题。大国,特别是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原来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和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法治化能力、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应当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从1992年开始,我便着手研究这个课题。当我刚一涉足“国家控制能力”这个领域,便立刻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因为这个题目太宏观,必须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因此,1995年回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便把“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作为主攻方向。1997年在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资助后,又进一步把题目确定为“当代中俄体制转型与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大约在1998年3



月,我写出了论文和结项报告的初稿。

说心里话,我自己对论文和结项报告的初稿并不十分满意。文章还缺少必要的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资料。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于1998年9月第二次赴莫斯科大学。而这次莫斯科大学给我的印象恐怕要用三个字来概括:更陈旧。楼还是那座楼,路还是那条路,房间还是那些旧房间,只不过需要维修的地方更多了。分给我的房间,水管在滴滴答答地漏水,窗户上玻璃少了五分之一。入住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修理水龙头,用纸壳糊窗户。当我再度漫步莫斯科的城区时,我的强烈感觉只有一个:现在的俄罗斯还在吃斯大林时代留下的老本。老本吃光了,还吃什么呢?这使我产生了对“国家控制能力”问题研究的紧迫感。然而真正使我坚定信心的,是我与俄罗斯学者形成的共识。第二次赴俄的第五天,即1998年10月3日,俄《独立报》发表了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在我国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但主要的不幸在于,我们国家预算实际上崩溃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它的预算数目却少于奥地利或比利时,而美国的国家预算高于俄罗斯40倍。”

从那时起,我便更广泛地收集资料,购买有关书籍,订阅《独立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每天夜间进行翻译和写作,把大量的、最新的统计数据 and 民间调查资料加以分析后充实进了论文和项目报告中去。12月的莫斯科可谓是大雪封门,我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几乎每天都写作到凌晨2点钟。这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许多资料都一再证明了我的理论假设,这让我无比兴奋。对此,我由衷地感谢攻读博士期间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是他们给了我政治学理论分析的框架,使我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得以提高和拓宽。由此我更加感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高度,这个民族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学者,就应该把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作为必修课。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就不会有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和建树。比如在国家控制能力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仅从俄罗斯经济基础好,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都很高的直观感觉出发,就会认为其体制转型应该更容易;而中国经济基础差,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体制转型难度会更大。但为什么实际结果和人们的直观感觉不一样呢?这就需要理论思维,需要对本质和现象加以理论剖析。

在运用理论思维论证渐进转型模式合理性的问题上,我经过了长时间研究和思考:1999年6月,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不久,我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大国转型发展之路——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为书名,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我为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本科



生开设“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选修课。在授课过程中,有两件事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一是政府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对我提出的渐进转型模式合理性的三个论点逐条进行“挑刺”,使我不得不对这些论点进行完善;二是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对中国家庭生产的传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使我深受启发。我从中真切体会到“教学相长”的深刻含义。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又经过两年的充实,我终于完成了全部书稿。

大约是在2001年前后,本书就已经基本定稿。我记得一位名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文章写完之后不要急于发表,先搁置到抽屉里,让时间清洗其中的污点。我照此办理了。此后,我研读了《俄罗斯文化史》《叶卡特琳娜传》等多部有关俄罗斯历史方面的书籍,以期从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来提升。应当说,尽管我对书稿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当时与读者见面的那部书稿,我自己并不是很满意,但我深知,在学术上每攀登一小步都是很难的,下一个高度只好留待以后去攀登了。2003年,《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秋,我第三次到莫斯科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在久违了的莫斯科终于听到了俄国人爽朗的笑声和看到了微笑的面容。由于“普京新政”的社会效果,俄罗斯终于摆脱了艰难的徘徊,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我多次去过的莫斯科大学已经不那么“陈旧”,整个主楼建筑群经过修葺,显现出蓬勃生机。尽管楼内的房间还有些破旧,但室内设施的功能都全面改善。200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6周年。这一天正是星期六,莫斯科的天气出奇的好。漫步在莫斯科大学主楼前面的广场上,沐浴着明媚灿烂的阳光,我看到孩子们在放风筝、滑旱冰;年轻的恋人在轻声细语;中年人瞧着自己的孩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老年人互相搀扶享受着阳光的温暖,这是俄罗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写照。我想,尽管中俄两国走的是不同的转型道路,但今天都显露出了大国的气度。就在这一天,我萌发了将已经出版的专著再版的想法。如果将“普京新政”和中共十六大以后的改革内容充实进去,更能反映出中俄两国转型的内在规律。我再一次开始了“以启山林”的工作。

历史的发展永无止境,中俄两国的改革之路也永无止境。当我的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刻,中俄改革进程中的两件大事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2012年3月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并于2013年12月20日特赦了包括霍多尔科夫在内的一批知名人士,其社会和解政策稳步推进;二是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向全世界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信心。中俄两国改革的规律性进一步显露出来。这更加坚定了我继续从事这一研究的信念。

本书表达的主题是: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历史传统、人们的习惯和

观念、政治文化等软性因素比规章制度、法律条文等硬性因素更重要。这些看不见的潜在因素决定着转型是否能成功。通过典型示范、局部试点、时机选择、观念整合等多种措施,尽量使思想变革和体制转型同步进行,是转型成功的最基本标准,这也为转型过程中国家的有效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硬性的制度变革实现了,但由于观念和价值观分歧太大,伴随着的往往是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腐败,转型就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渐进转型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可以使硬性制度和软性因素协调共进,使社会更加和谐发展。而在转型深入发展的阶段,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统领,构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精神支柱,是转型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我还想用这样一个例子来体现本书的主题:俄罗斯的叶卡特琳娜女皇在领导俄罗斯的改革过程中,多次向法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去求教,后来还邀请他到俄罗斯以便亲自聆听“理论指导”。德尼·狄德罗见到叶卡特琳娜后,“无拘无束,大摇大摆,俨然是一位能与女皇平起平坐的老人。他在女皇跟前高谈阔论,指手画脚,来回踱步,目不斜视”,并多次抱怨叶卡特琳娜的改革搞得太慢了。叶卡特琳娜对他说了一段富有哲理并令人深思的话:“狄德罗先生,在您的改革、改良计划中,您忘记了我们两人之间工作性质的差异。您只是在纸上工作,一支笔、一张纸,最多再加一张桌子。纸上的东西是逆来顺受,千篇一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您只管写出来,既不妨碍您的思路,又不会抗拒您的笔锋。我也是写字,但我的字是写在俄国人的脊背上面。人是千变万化的、有喜怒哀乐的生灵,您想好了,他却变了,同样一个主张,适合您,又不一定适合他,所以就不像在纸上工作那样轻巧。”本书亦试图通过对中俄体制转型过程中各种不断变化的复杂因素的分析,来论证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及其深入的途径。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说写这本书内心的一个动力: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说过: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但我还是想说,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在毛泽东时代生长起来,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见证者,并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仅举1976年为例,当时我在长白山里面的三线工厂作一名基层干部,经历了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悲痛,感受到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彷徨,走过了唐山大地震的惊恐,目睹了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担忧,又抒发了粉碎“四人帮”的喜悦。那一年真是惊心动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从一个角度将这个时代记录下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担当,也是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具体行动。记录下来重要目的,就是要使以后的路走得更坚实。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丹尼尔·贝尔的话也许是对的,毛泽东也明确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



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也可能过多少年以后再来看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是渺小的。但每代人都为下一代人起着铺路石的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为了下一代的更加辉煌,让我们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拥抱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吧。

关海庭

2014年1月23日于北京大学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关于本书的主题和主要内容	1
二、研究的方法	15
三、基本的概念体系	20
四、研究中俄体制转型模式问题的意义	30
第二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进程的宏观描述	34
一、中俄体制转型进程时间内涵的界定和背景	34
二、中俄体制转型启动阶段的比较	37
三、俄罗斯(苏联)体制转型的进程	42
四、中国体制转型进程的宏观描述	67
第三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社会历史背景的比较	81
一、中俄体制转型历史传统的比较	81
二、中俄体制转型的国情背景的比较	93
三、俄罗斯体制转型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	103
四、中国体制转型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	109
五、中俄两国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转型模式的影响	112
第四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原因比较	115
一、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经济原因分析	115
二、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社会过程和心理原因分析	124
三、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体制原因分析	133
四、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政治文化原因分析	147
第五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中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评述(一)	165
一、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政治分析	165
二、苏联解体的体制原因分析	178

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评述	191
第六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中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评述(二)	202
一、叶利钦改革思想简评	202
二、俄罗斯“私有化”评述	217
三、邓小平渐进改革思想研究	229
四、普京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247
第七章 中俄两国转型模式与国家控制能力	263
一、两种转型方式与国家财政控制能力	265
二、两种转型方式与国家的法制化能力	274
三、中俄两种转型方式与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	283
第八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一)	289
一、中俄两种体制转型模式的社会后果	289
二、体制本身的约束条件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303
三、中俄两国国情的特殊性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315
四、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的国际背景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318
第九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二)	323
一、中俄两国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状况	323
二、中俄两国贫富分化的最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	331
三、中俄两国贫富分化与社会中间阶层	340
四、中俄两国贫富分化与社会稳定	344
五、中俄两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基本思路	348
第十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的国际比较	352
一、第一个视角:同其他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	352
二、第二个视角:同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比较	360
三、第三个视角:同采用激进转型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进行比较	370
四、第四个视角:同金砖国家间的比较(印度、巴西、南非)	373
五、俄罗斯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论中俄体制转型问题	382
第十一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途径(一)	390
一、中俄两国体制转型面临的国际背景	390



二、俄罗斯渐进转型模式的全面实施	393
三、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伟绩及局限	399
四、中俄两国转型发展深层次的障碍因素	403
第十二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途径(二)	412
一、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总体分析	412
二、中俄两国转型深入的基本国内背景	416
三、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政治分析	418
四、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经济分析	426
五、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政治文化分析	433
六、中俄体制转型的经验和深入的原则	440
主要参考书目	449

第一章 绪 论

发生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和俄罗斯(前苏联)的体制转型,走过了惊心动魄的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个过程所反映出来的一般和特殊的规律,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并为人们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分别采取了渐进的和激进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模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深入研究这两种转型模式及相关问题,对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的继续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本书的主题和主要内容

本书定名为“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探讨制度变迁的规律,特别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规律。

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人主要是社会人,有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制度的设计和形式,则受到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这样就构成了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即人、价值观和制度。其中,价值观是基础,包括体制转型的标准和目标等因素;人,主要包括体制转型的发展动力;制度,是体制转型发展的主要手段;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体制转型的目标、动力和手段的统一。

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人的自主、独立与解放,人们很容易看到,人要获得解放,就要取得权力,并要有制度的保障和引导,所以,现代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把视野集中在国家权力与制度建构上,即集中在政治的制度层面,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治学都把制度的设计、确立、运作与改善作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而忽略了政治生活的另一极——人的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对这一取向的纠偏,政治学走向科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于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关注人的行为。“行为主义者认为,为了能够理解政治并解释政治产出,分析者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制度的属性上,而应该集中在非正式权



力分配、态度和政治行为上”。^①

在行为主义成为主流政治学理论的年代,制度被认为是次要的东西,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视野之外。行为主义集中考察了民主社会中公民投票的倾向和偏好,示威、罢工甚至暴乱等政治参与的渊源。行为主义还研究了精英和利益集团的行为,“在精英层次,行为主义者研究了领袖行为,并在领袖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态度与价值)与他们做出的特殊行为之间的关系上着重进行了研究。在社会群体方面,行为主义者考察了利益集团的行为与政党的行为”。^② 在行为主义发展的时期,提出了“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概念,大大推进了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但制度的作用曾一度被忽略。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新制度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新制度主义中有很多流派,但最基本的观点主要包括:第一,对制度的解释:认为“制度最好被理解作为一种规范、规则、协定和惯例的集合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惯例”。^③ 简言之,制度既包括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规则。第二,制度不仅影响行动者的行为,而且影响了行动者偏好的形成,反过来,这种偏好直接影响到对制度的设计。第三,“路径依赖”是推动制度发展的重要途径。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事件或者政治选择发生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因为不同时间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者进行的政治选择,使制度形成之后,就会使制度沿着一定的路径存在下去,这不仅会限制未来政治选择的方向,而且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最初的政策与制度选择,由此形成的模式将被延续下去,除非有足够的力量克服项目起初形成的惯性。”^④ 第四,“观念、制度与个体理性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政治事件时的基本变量。”^⑤ 其实,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人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这既克服了传统政治学单纯研究制度的局限,又避免了行为主义仅仅关注于“人”自身的偏差。这种互动性从一个方面较好地解释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规律。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将中国和俄罗斯的体制转型放在制度变迁这个特定的大背景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① 何俊志等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② 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美]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④ 同上书,第71页。

⑤ 同上书,第7页。



（一）制度和人们之间的互动是转型的最基本的规律

中国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阵痛之后,人们都在总结其内在的原因和教训。主流观点更侧重于从制度和体制上寻找原因,认为“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①但也有人更侧重于从人本身寻找原因,认为制度是人制定的,“不要一出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是人!是用上人出了问题”“用好人,办好事;用坏人,就只能办坏事!”^②实际上,这个问题如果综合起来看,可能更接近于真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③。这就是说,人们是在同制度的互动中进行改革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创造出促使人和制度进入良性互动的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就是制度文化。要有良好的硬件条件,还要有良好的软件条件。

首先,人和制度的关系是制约和引导的关系。人需要制度的制约,因为人性是有弱点的。每个人的不同的经历,人的不同年龄段,人面对的不同的环境,人的弱点表现有所不同。现在很多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几乎都认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比较果断和有气魄,但殊不知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和特殊的环境,就需要这种果断和必要的服从,战争时期就需要这样的领导方式,否则毛泽东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袖。但是到了建设时期,这种领导方式的部分内容就不适应了。特别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毛泽东越来越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之后犯了发动“文革”这样的政治错误。因此,任期制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设置的一项重要制度,尽管有其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利大于弊。任期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制度更需要人的引导。人很重要的是要设计好制度,设计好的制度后不要轻易改变,因为制度的优势在于稳定的预期,有了稳定的制度才能形成良好的习惯。人们设计制度时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继承以往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精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二是要使多数人有接受的习惯基础。美国的开国元勋在设计美国制度时,将欧洲政治文化的精华吸收进来,美国当时的欧洲移民居于多数,也能够接受这种制度设计,因此,美国的制度设计是成功的。简言之,欧洲的政治文明在美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其次,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是文化基础上的观念。制度和人的观念要大体上保持一致,这是制度变迁的基本条件。如果制度的变化过于超前,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②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张爱萍人生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51页。

③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页。

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发挥其效用。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俄罗斯缺少市场经济的传统和基础,千百年来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同时又有着深厚的专制主义传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夜之间实行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使得人民无所适从,无论从观念上还是行为上都严重滞后,其混乱局面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如果人的观念过于超前,超过了通过制度来固化观念的可能性,好的制度也无法建立起来。中国在1958年前后搞“一大二公”,向人们灌输“按需分配”的观念,导致了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不得不退回到“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状况,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如何能够使人们的观念和制度进入良性的互动环境中,这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课题,根据中俄体制转型的实践,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形成态势。所谓要形成态势,就是使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状态,并要解决“路径依赖”问题。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意味着任何现实的制度选择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已有历史积累的结果,是已有历史的延伸。进一步说,任何国家的成功都不是由于割断了历史,而是因为寻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均衡点。这是因为,一是制度和体制本身是一个体系,其中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以法律为主的各种需要强制执行的规则,非正式规则包括习俗、文化和传统等。在这个体系中,正式规则可能会不断变化,但非正式规则却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非正式规则的生命力来源于社会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信息和文化遗产,它是一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曾经说:“文化的渗透方式提供了连续性,因此,过去解决问题的非正规方式又带到了现在,使这些非正规约束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源泉。”这就是说,非正式规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对经济制度和体制备选方案的判断、设计和选择,是经济制度和体制选择中起深层作用的因素。二是制度和体制变迁的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性。正像科学知识的积累影响技术创新的成果一样,有关制度和体制安排的知识积累也影响着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可能性。而知识的积累是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这就决定了知识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当用这种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知识来指导制度和体制选择时,制度和体制选择的路径依赖性也就具有某种必然性了。

路径依赖的存在给我们的启示是:制度是可以移植的,但一定要有文化基础。美国开发西部时,美国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基地法》,人们涌向了西部,开始了开发西部的大潮。美国人一到西部的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先修建一个教堂,并建立一个法庭。依靠宗教来对人们进行道德约束,依靠法律来对人们进行制度约束。美国人当时多数是欧洲移民,将欧洲的法治传统较好地移植



到了北美大陆。美国当时的国家是弱化的,但依靠人们的高度自治能力,建立起来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人和制度的互动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制度在原有体制中获得突破,很大程度上是压力逼出来的。苏联共青团在体制中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不断遭到弱化,它们几乎没有经济来源。体制中的漏洞是团组织开始揭开的,他们寻找一种能够继续维持生存并且能为他们的生意争取一些特权的权力,包括开咖啡厅和迪斯科舞厅在内。1987年12月28日,团中央给地方团组织下达了一套新的金融规定,允许它们按自己的意愿筹集和支配资金,允许它们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这是和自筹资金精神相一致的。其中有一条规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共青团组织可以将现金和非现金信用混合使用(在新的规定发布以前,这种实践可能已经进行了一年)。青年组织能够做那些工厂领导不敢做的活动:把几乎无用的非现金信用兑换为现金,并且通过在莫斯科郊外建立质量好的全木制别墅给某些人作为回扣。这样就给赚钱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实际上就是无本万利。

制度最初形成要有一个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口号和原则:如“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将人和制度互相促进的好办法。从计划向市场转型,人们既缺少市场经济的观念,也没有建立市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逐步探索,走一步看一步。观念变化了,建立起适合这种观念的制度;制度建立起来了,又推动人们观念的继续转变。

第二个条件就是扩大交流。诚然,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现实的制度之间是有距离的;如果这个距离太远,制度远远落后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或者制度超出了人们观念所能容纳的程度,都会出问题;但是这个距离如果太近,或者融为一体,又使得观念价值无法引领制度向前发展。这个距离的科学性永远不是恒定的,也很难找出一个公式般的说法。原则性的说法是,价值观念引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又巩固或者推进人们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做到这种良性循环呢?其实,只能通过扩大开放,让人们对不同的制度有一个比较选择的过程。因为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的习惯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在最初的生活中形成了很多习惯,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的需要,将其中一些习惯上升为共同遵守的习惯;再随着发展,又将这些共同的习惯上升为一般规则,制度便形成了。制度一经形成,其优势便显露出来,这些优势表现为:第一,减少交易成本。人们交往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通过制度规则可以降低。第二,预期提高效率。按制度要求合理安排,效率会大大提高。第三,促进社会公平。制度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相对公平程度提高。第四,改变人的行为。制度使人按照制度要求向好的方向发展。

第三个条件就是注重引导。制度变迁是有规律的。既然制度是在人们生



活中逐渐形成的,那么,要想使人和制度之间良性循环,科学地推动制度变迁,也是有一般性的规律值得研究的;推动制度变迁,有几点是可以提出来的:

(1) 创新性。这其中的创新,更多的是指理论创新。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①。理论一经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好的理论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但僵化的理论又可以制约人的实践,因此,“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②。通过中俄体制转型模式形成原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坚持理论和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和俄罗斯采取了不同的转型模式,并且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这其中固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诸如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或者决策失误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苏联前几代的领导人,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他们从整体上思想僵化,拒绝改革,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体制改革的时机,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导致体制的积重难返,为后来改革者的成功留下较小的余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对体制转型的失误是要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的,但这种失误很大程度上也是长时期体制僵化所带来的后果。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的原存体制,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没有造成体制本身积重难返的局面,加之邓小平在改革之初的正确决策,使中国走上了渐进改革的光明坦途。通过这种比较,使我们牢固树立理论和体制创新的思想观念是十分重要的。

(2) 开放性。这个问题指的是制度本身的开放性。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很有可能成为保守势力的挡箭牌。制度的开放性有两个含义:一是制度自身的开放性,包括定期的清理和修改、退出机制;二是狭义的制度和文化的互动机制,主要是指人们之间的交流。如果想从主观上测量出人们的观念和现实的制度之间的距离,那仅仅是一种空想。只有通过文化和制度上的交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创造出让各种文化观念自由交流的环境。在正常的交流过程中,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优胜劣汰。观念之间的变化不仅仅是靠经济来推动的,同时也是靠文化之间的交流来推动的。在交流过程中,人们才能找出科学评价制度变迁的坐标,也才能知道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3) 试验性。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制度体系内部的协调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或者说是一种有限理性。在特定的条件下,很多问题一时看不清楚,如果贸然行动,会适得其反。如果条件允许,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最好先进行试验或试点,即找出有代表性的地方先行一步,取得经验后再逐渐推广。这样便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避免给全局造成危险。在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